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张一弓

ZHANG YI GONG

代表作

中国现代应限期还作家文库

张一弓代表作

顾传菩 编

黄河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曲哲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张一弓代表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13.875印张318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50册

ISBN 7—5400—0146—1 / I·135 定价5.95元

前 言

九年前，在中国的当代文坛上出现了一部引起轰动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它以题材的独特、矛盾的尖锐、思想的深邃和色调的强烈，震惊了文坛，它的作者就是张一弓。

张一弓于一九三五年元月生于河南开封，父亲是原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母亲是高中语文教师。他自小酷爱文学，在富有文学氛围的家庭中成长。一九五〇年，他在开封高中的写作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经学校介绍，到《河南大众报》（办给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看的通俗报纸）当记者，那年他才十六岁。一九五六年八月，张一弓入党。一九五六年十月，《河南大众报》与《河南日报》合并后，他到河南日报社工作。同年，发表小说，梦想着为文学事业作出贡献。谁知，一篇题为《母亲》的短篇小说，招来了祸害，受到无休止的批判。因为他的母亲被定成“右派”，儿子写母亲，自然是“为右派母亲唱赞歌”。此后，他只好遏制对小说创作的冲动，全身心地转向新闻事业。“文化大革命”中，他曾被关入“牛棚”，受过批斗，也曾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程。幸运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有机会到农村工作，担任登封县卢店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亲身参加了我国农村以实行联产承包制为其主要标志的历史变革，亲身经历着我国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的深刻变革。这段难得的可贵的经历，使他的思想产生了飞跃。建设者和战斗者的身份，毕竟与旁观者不

同。他有那么多独特的和深切的感受、体验要表现出来，这样，中辍二十余年的文学之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他人到中年时，重又挽起艺术之弓射出的第一箭，命中目标了。如果没有卓越独特的识见，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是难以写出这样好作品的。人们发现和承认他是个好射手，他手中的那张弓，是件锐利的武器。几年来，他一发而不可收地连续写出了《赵毓头的遗嘱》、《张铁匠的罗曼史》、《山村诗人》、《流泪的红蜡烛》、《山村理发店纪事》、《火神》、《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孤猎》等十四部中篇小说，和《黑娃照相》、《寻找》、《牺牲》、《瓜园里的风波》、《最后一票》、《翠翠》、《挂匾》等十几个短篇小说，约一百余万字。其中，《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和《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均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人民对他的创作，给以高度的赞赏和肯定。张一弓深有体会地说：“没有三中全会，就不会有《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也就没有我张一弓！”他还说，“如果没有生活对我的直接教育，没有这场变革的实践给我带来的认识上和感情上的变化，便没有我从《赵毓头的遗嘱》开始的，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十多个中短篇习作。”（张一弓：《听命于生活的权威》）是的，是时代造就了这位勇于追求并卓有成就的作家。

张一弓常常提醒自己：“要追随时代的步伐，为正在经历着深刻变革的我国农村做一些忠实的‘记录’。”（张一弓：《听从时代的召唤》）

如果我们将张一弓九年来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按写作年月排

列起来，可以看到，我国农村在怎样一步一步地前进。他的小说，像是一面面镜子，映现出今日农村结束饥饿和贫困，走向富裕和繁荣的崭新面貌，映现出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正在展开着的伟大经济变革的历史必然性，映现出当代农民对精神文明的渴望和追求。罗曼·罗兰在《论作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中指出：

“伟大艺术家永远是自己时代的眼睛，时代通过这只眼睛来看自己，并且见到了自己。”这大概是包括张一弓在内的当代许多有成就的作家们所追求的美学理想。

张一弓的作品，大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他关注和思索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长期的记者生涯和在农村工作多年的经验，使他熟悉农民，热爱农民，理解农民，在他的作品里，较好地体现了当代农民的意志、愿望、感情和理想。

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作者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大胆地揭示了“大跃进”及其以后那一段严酷历史的“伤疤”，真实地惊人地反映了“大跃进”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导致农民缺粮、断炊，处于严重的饥饿状态，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了当时汹涌恣肆、泛滥成灾的左倾思潮，并追溯、寻求这种历史现象的根源。“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卡·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张一弓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的忠诚，艺术地再现这段历史，是为了这样的生活永不返回。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无私无畏的富于牺牲精神的李铜钟形象。他既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哄抢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这水火不相容的两种身份，竟统一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所以会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个囚犯，恰好是因为他是一名真正为了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这就非常尖锐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奇特的惊人的矛盾。是特有的时代酿成了李铜钟的悲剧。李铜钟倒

下了，可是他的光辉形象，却像铜钟一般，经得住时间的经久考验。李铜钟离开人间时的最后呼喊：“救救农民吧！”像历史的钟声，在人间久久回响。

拯救农民，叫种粮食的吃上粮食！终于，“治穷”的道路找到了，那就是真正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的联产承包制。张一弓于一九八〇年到河南省登封县卢店公社工作，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源于群众的伟大创造。《赵镏头的遗嘱》，就是他亲身经历这场农村现实斗争生活的产物。

在《赵镏头的遗嘱》中，作者艺术地记录了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变革。这场变革首先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以赵镏头等贫苦农民为一方，同龚大平这个思想僵化的地委领导人，和李保等附着在“大锅饭”的锅沿上的基层干部、懒汉、寄生虫等，围绕着联产承包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这是有关十亿人民命运的大事，是一场真假社会主义的斗争。作品塑造了一个智慧和勇敢的赵镏头形象，他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捍卫了农民的利益和他们的历史创造。作品对农民为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性，给予了热情的颂扬和肯定。赵镏头死后，县委书记林慧说：“我们这些穿四个兜蓝布褂褂的人，过去往农民那两个兜里掏东西掏成了习惯，成千成万地掏，掏得越多越革命。而一旦那两个兜里刚刚要装进一点东西，我们的一些职业革命家立即惊叫起来，好像那两个兜里潜藏着资本主义的酵母菌，会使任何东西发酵、霉烂、变质，变成资本主义的妖精。”这段反思历史、反省自己的透彻话语，帮助我们认清了这场斗争的实质，而那不能让赵镏头同志“去另一个世界继续当一个贫农”的呼喊，则在活着的人们的心灵上造成了强烈的震颤。

遗憾的是，正像一些评论家所作出的分析那样，赵镏头自杀

的结局处理，有人为的痕迹。虽然作者说，这是他有感于邻近公社一个生产队，因推翻承包合同而使得一对农民夫妇喝煤油自尽的事情而写的。然而，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毕竟不同。作品里的赵锬头，是一个有高度政治觉悟、能看出历史趋向的共产党员。在他性格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包含自杀的必然因素，而小说中所描写的他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也没有提供这种结局的必然条件。作者为了强化主题，为了追求人物命运戏剧性的高潮，人为地去激化矛盾，硬是将人物纳入自己主观规定好的框子里去。这一艺术失真，多多少少影响了这部作品的审美价值。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去思考，那么联产承包制的创造，确实是伴随着农民的血与泪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所描写的挣扎在饥饿线和死亡线上的李家寨几百口村民们，还有西门外支起的三口大锅和卧龙坡车站上挤满着等着扒车逃荒的社员们，以及出现在这幅背景前面的犯人李铜钟，不都是可以视为联产承包制诞生以前，历史向农民索取的血与泪的昂贵代价吗？即使在中共中央关于推行联产承包制决定颁布之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又何尝不是尖锐的斗争？在斗争中，血泪相和的事件总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何况《赵锬头的遗嘱》是写在中央决定颁布之前。它的缺点主要的是艺术上的缺陷。所以，这份带血的记录，还是值得保存和阅读的。

《寻找》，《张铁匠的罗曼史》、《黑娃照相》，《最后一票》，均写于一九八一年。此时，那赵锬头为之牺牲的，让农民和土地“恋爱”，叫劳动跟幸福“结婚”的新政策，已在逐步推广，并初见成效。农村在变，农民的心理也在变。张一弓及时地记下了农民刚刚赢得这种新生活时那种亦喜亦惧、尚不安稳的心情。《寻找》是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叫马套的农民在

集市上丢钱、寻钱的故事。在这个简单的小故事里，蕴含着深沉的内容。它是一篇用饱含哲理的诗一般的语言写成的政治抒情型的小说。请看，作者写道：“马套啊，寻找吧！你失去的已经太多，而你得到的只是刚刚得到。”“寻找吧，马套，忘掉过去，寻找今天吧！”“这是一次痛苦的寻找。他没有找到失去的财富和同时失去的美好的憧憬，却只找到了历史的忧伤和现实的不幸。”“去劳动中寻找自己吧，马套！……赶快振作起来，去劳动中寻找你美好的未来吧！”可是马套在想，今年丢了的，明年还能挣回来吗？他“掏出一枚唯一幸存的五分钱的‘钢镚儿’，‘丢了下去’，想试一试‘命运的裁判’”。这一细节，读着令人辛酸，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农民害怕“政策再变”的不安心理。《张铁匠的罗曼史》以二三十年的时间跨度，从张银锁和王腊月之间忠贞和凄婉的爱情故事的细腻描写中，去探索和表现农民的命运。他们的悲欢离合、曲折而离奇的“罗曼史”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极左路线、政策紧密相关。张铁匠不敢在“铁匠专业户定工定值合同书”上按指印儿，正是他几十年生活经验在心理上的痛苦反映。小说给这个悲剧以喜剧结尾，在张铁匠夫妇的复婚之夜，他们和儿子铁拴一起，在合同书上“按上了一家三口的指印儿”，以表现农民对新生活的信念和对未来的希望。《黑娃照相》，是作家机敏地从迅速流动着的生活中拍摄下来的一个不被人注意的镜头，描写了十八岁的黑娃被新政策所鼓涌起来的一种心劲儿，他有许许多多物质的和精神的追求，可眼下只有八元四角钱，太少了。他说：“再过两年，咱来真个的！”他望着山下的庙会，望着那鳞次栉比的货棚、饭铺，大声喊叫着：“你们——统统的——给俺留着！”写出了农村新一代农民对新生活的喜悦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最后一票》则是从另一角度的思考，

要想捍卫新生活、新政策，就必须重视和捍卫手中的民主权利。

不到两年，在《流泪的红蜡烛》里，主人公李麦收就“来真的”了！这个新时期的“种烟状元”，用两亩地的烟钱娶来了一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可是，在这新的“真的”里面却包裹着一颗旧的内核，那就是精神的贫困与落后。这种精神的贫困与落后是可以使喜剧变成悲剧的！《流泪的红蜡烛》，是作家根据生活里一个刚刚发生的新娘哭嫁、拒婚的真实故事写成的。张一弓以他特有的历史眼光和高度的敏感，从这场阔绰而又荒谬的婚姻破灭中，发现了农村青年正萌发着的一种新的历史追求。新娘白雪花在新婚之夜的“俺是人！是人！是人！”的愤怒而悲伤的呼唤，终于使被严酷的人生扭曲过的新郎李麦收醒悟了，他主动解除婚约，面对着乡亲们，他大声地说：“我李麦收，还有你们，大嫂子们，小兄弟们，也都不能忘了，咱也是人，是人！要是前几年咱把咱这‘人’给忘了，眼下就得想起来，赶紧！”是的，人应当有个人样，人再不是羔羊，可以任随命运摆布，人再不是吃粮食的牲口，可以不去思想。人应该有美好的道德、情愫，应该有高尚的爱情，还应该有着崇高的精神追求。《流泪的红蜡烛》的发表，标志着张一弓作品的主题开始由吸取沉痛的历史教训，描写农民摆脱物质贫困的抗争到反映农民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追求精神文明的转换。这部作品所反映的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生活，很有特点。作者真实地记录了农村刚刚出现的物质生产有了较大发展而精神生活依然“贫困”的矛盾，他大胆地给读者描绘了一幅新的与旧的、文明的与落后的、科学的与愚昧的、高尚的与低下的、社会主义的与封建主义的掺杂在一起的色彩斑驳的生活图画。这一些似乎会使人感到有些不协调，但又不能不承认，它却是真实生活的写照。《流泪的红蜡烛》开首第一页所描绘的

“种烟状元”李麦收的奇特的迎亲仪式，可以说，具有社会学和民俗学的价值。

一九八四年，《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发表了。此时在中国农村的大地上，联产承包制已经扎根开花，正处在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许多剩余劳动力正离开土地去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作家自己也承认，即使在一年前，也难以想像驾驶汽车的农家姑娘会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在一九八四年春天，他却有幸结识了六个“汽车运输专业户”的司机姑娘，她们是真正从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她们在创造新世界的同时，也在塑造着自己的灵魂。春妞儿是她们的艺术典型。杨春妞已经不像《流泪的红蜡烛》中的白雪花，只会发出“俺是人！是人！是人！”愤怒而悲伤的呼唤，而是以她自己的行动，博得了人们的尊重。她是全地区司机考核的头名状元，她行为端庄，作风正派，不怕那些当面和背后的议论、诽谤，她不愿再去当“顺民”，不愿为了让人看着顺眼，而舍了小戛斯。她那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地位，以及对现实生活中某些不公正的所谓“合理现象”所作出的抨击和抗争，是令人深受鼓舞的。这篇小说，真实地表现了社会生活在人的性格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在人的社会生活中，经济生活又是最主要的内容。再不能用老眼光去看待农民了。在春妞儿身上，我们看到了新型农民所具有的新气质、新观念和新的精神世界。

《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发表于一九八五年的春天，又一次引起了文坛的注目。作品从更深的层次上去探究新时期农村人们的精神领域。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物质富裕，不仅要有所作为，还要去寻求那早已被人忘却了的最珍贵的人格与尊严。虽然寻找的步履如此艰难，但他们还要去寻找，应该去寻找！李麦收在

《流泪的红蜡烛》中曾经喊出的：“要是前些年咱把这‘人’给忘了，眼下就得想起来，赶紧！”在这篇新作中，宋福旺作出了回应：“把人样找回来！”《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艺术地再现了宋福旺怎样在历史的云烟里失落了自己，又怎样找到了另一个自己。“人”字，虽然很好写，只有两笔，可是做人，却很难很难。小说“记录”了我国正在进行着的伟大经济变革所引起的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它正在涤荡旧世界遗留下来的种种精神污垢，中国农民做一个真正人的时代已经到来。

一份份“记录”翻过去了。在中国的作家中，赵树理和柳青最有资格代表农民，那么要艺术地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民的面貌和心理时，怎能忽视和忘记张一弓所撰写的这一份份深刻上时代烙印的艺术“记录”呢？

张一弓的这些“记录”，有着鲜明的特色：一、从生活中来，作品中许多人物都有其生活原型。作品是受现实生活的触发而写的，绝不是向壁虚构的产物，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有一种可贵的真实感和新鲜感；二、有明显的时代色彩。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与时代风云息息相关。他的作品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小摆设、小玩意儿。他每一篇小说的发表，几乎都在社会上引起了或大或小的反响；三、作品中渗透着深刻的历史意识。即使在一个短篇中，也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结上去把握生活发展的轨迹，现实性和历史感融合在一起。仔细看他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是相通的，互有联系的，像是系列小说，像连续剧。作品的主题，在随着生活的演变而转换、深化。四、相信自己的头脑，相信自己的眼睛，听命于生活的权威。他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是他在生活中的新发现、新思考。在文学艺术领域内，他是一个开拓者和创造者。因此，他所撰写的这一份份“记录”，就具备了独特的价值。

张一弓的作品，不是牧歌，也不是小夜曲，是一首首震撼人心的命运交响曲。他将写人，写人物性格和命运，作为自己作品的艺术追求。

在他约一百余万字的作品里，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农村人物形象，组成了一幅农村社会生活画卷。有地、县、公社、生产队的领导干部，也有普普通通的庄稼人；有为民牺牲的共产党员，也有榨取农民血汗的“败类”；有带领劳动群众致富的农村改革者，也有阻挡农村变革的“绊脚石”；有强烈要求改变自己命运、地位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农村新人，也有尚不觉悟、安于现状的芸芸众生。

在这些众多的人物形象中，作者着力刻画的是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生活的强者。如：李铜钟（《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赵锺头（《赵锺头的遗嘱》）、郭亮（《火神》）。他们都有一个曲折、坎坷的命运。他们的性格是在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中表现的，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绘的，是在生死存亡、荣辱升沉、变幻跌宕的际遇中展示的。作品表现他们在逆境中的奋发和抗争。他们是中国农村的脊梁。他们的意志，代表着人民的意志，他们的感情，代表着人民的感情，他们的理想，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趋向。作品通过塑造这些形象，表达了深刻的主题，表达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永恒的主题。这些人物性格的基调鲜明而强烈。不足的是，对他们丰富的内心活动还揭示得不细微、不充分。尤其郭亮，心理过程简约，影响了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宋福旺（《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是另一种类型的强者。他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但在他的灵性里却掺杂着许多不是一眼能看穿的复杂的东西。在塑造这一形象时，作家似有意将作品外部情节结构和内部

心理结构结合起来写，对他在这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作出新的开掘，较好地表现了这个人物性格中主色和杂色的统一。

在张一弓的作品中，还注意刻画农村新一代的形象。如明娃（《赵镢头的遗嘱》）、拴娃（《张铁匠的罗曼史》）、黑娃（《黑娃照相》）、麦收、雪花（《流泪的红蜡烛》）春妞儿（《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是初、高中毕业生。他们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快，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一种不肯安宁的、冲撞旧传统的创造力。明娃是枣园沟生产队的小会计，是个有心人。赵镢头死后，他被选为队长，他带领群众，按照赵镢头的遗嘱继续干下去。拴娃比他爹有远见，也敢闯，你听他对张铁匠说：“爹，这指印儿我替你按上，要是以后挨批，就叫他们找我张铁拴。”这些话显示出农村新一代的刚强锐气。雪花对爱情的执着追求，麦收关于“咋做人”的思考，以及春妞儿为主宰自己命运所作出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都说明他们是中国农村成樑成檩的好材料。明娃、拴娃，在作品中还只处于从属地位，对他们的性格、命运，没来得及充分展示。麦收和雪花，更多的是从爱情婚姻的角度去表现。春妞儿则是处在矛盾中心的农村变革中的一员闯将。在《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中，作品用意识流动、时空转换、回闪等一些新技巧，用少有的细腻而温柔的文笔，去塑造这个外表倔强、刚烈、泼辣，内心却异常温顺、善良、深沉的女司机形象。通过对她三次不同爱情的描绘，写出了她思想的成长，她到底战胜了命运，掌握了自己生活的主动权。作品将小说的情节性与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结合起来写，获得了成功，使这一人物的性格更为丰满、生动和完整。在写景、抒情、状物上，也较以前的作品，更为精致、细腻。细心的读者，透过《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

可以发现张一弓的艺术潜力，可以预感到他的创作将会有新的突进。

还有，张一弓对普通庄稼人形象的塑造，也很重视并颇具功力，哪怕他们只说一句话，或只出场一次，也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如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出场的那位老杠叔。他对党是那样的忠诚和爱戴，他用他那朴素的语言去解释这场灾难，说：“毛主席不叫咱冻着，……就不会叫咱饿着。……兴是年前风老大，电话线刮断了，……上头跟底下断了线，……等两天，再等两天，……等电话线接上。……”读着这样的话语，不禁使人潸然泪下。老杠叔的心声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千千万万普通庄稼人的共同心声。作家只用了这么一句话就写活了一个形象，显示了他的艺术功力。还有《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中那位不知名的修桥老人。桥窄、负载量小，汽车难以通过。可你听听他的声音：“这是俺领着俺一家去修的义务桥，俺临走就给俺村留下这座桥，接接大汽车。”他要以他生命的微弱之光给人间留下些许温暖。他对春妞儿说：“你们再来时，要是没有我了，你们就把桥这边那棵老柿树当成我吧，我就一直站在那儿，等着，盼望！……”作家将这位老人希望农村变样的心情，写得何等委婉和动人！作品曲折地反映了八十年代改革潮流在一个中国老农民心灵上的影响。张一弓是一位善于从生活中提炼有特色的语言、对话、细节，来为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作家。

张一弓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特点是：主观色彩浓。他的热情、思想和理念，与所要描绘的人物、事件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的，爱他们的所爱，恨他们的所恨，是他们的所是，非他们的所非。他笔下的人物性格强烈，思想倾向鲜明，感情炽热如火。这样的作品容易产生感染力和社会效果，但也常常会缺少一种含蓄蕴藉

的美。有时为了急切地表达某种理念，往往会产生思想大于形象的缺点，硬将人物性格、命运纳入作家主观意志的框框里去，造成人物的失真。近两年来，作家对此有所注意，他在人物塑造方面，在揭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追求人物性格的多色调、多层次，使人物成为具有真实感和立体感的艺术形象方面，作出了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张一弓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谨、谦逊，在艺术上不断追求，不断前进的作家。

就像张铁匠的镰刀上，砸上了“飞镰张记”的钢印儿一样，张一弓也在挥臂锤炼着他的文句，直到在他的作品上，刻上了他自己的标记。

他喜欢在有限的篇幅里去正面展示无限广阔的社会生活，习惯于将人物置身在重大的矛盾冲突中去进行刻画、塑造。常常采用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结构方式，促使人物产生强烈的行动。作品追求的是一种磅礴、奔腾、开阔的气势和严峻、凝重与幽默、戏谑相结合的风格特色。他的作品不是从山涧流出来的委婉、曲折、纤细、幽深的小溪，而是从高山上倾泻下来的江河，挟泥带沙，奔腾呼啸，斑驳陆离。

张一弓的作品，是写农民的，因此他十分注意自己的作品要易于农民所接受。他的作品大都情节性强，戏剧性强，以丰富生动曲折的情节和人物戏剧性的命运来吸引读者。他的一些作品已被拍摄成电影或改编成话剧，如：《张铁匠的罗曼史》、《流泪的红蜡烛》和《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在他的作品中，常常追求一种悲喜交融、悲中有喜、喜中有悲的艺术境界，并以喜剧结尾居多。这不仅是他着意于：“革命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与高昂理想的统一”（张一弓：《听从时代的召

唤》)，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农民的欣赏习惯。

在张一弓的近期创作中，在他富于喜剧性的作品中，越来越显露出他那独有的“乐处生悲”的艺术特色。如：短篇小说《挂匾》，写的是一次由县长率马挂匾富于喜剧性的“夸富游行”，结果是什么呢？却是悲哀，是一个山里吃红薯干的闺女的毁灭。

“能不能省下这夸富的功夫，叫这干粮兜里也变变模样。”这意想不到的结尾，使小说的主题得到了深化。再如：《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写宋福旺在获取财富和在历史云烟里找到另一个自己时，他扒在他爹的坟头上，“像孩子那样不知羞地哭着”。因为，失去的永远失去了，想找回来的永远找不回来了。这是时代的罪过，也是历史的真实。作品的深刻性恰恰就在这里。

“乐处生悲”，往往能帮助人们更深刻地去理解生活。

在张一弓的作品中，还常夹有闹剧因素，或干脆就是一出闹剧。如：在《赵镢头的遗嘱》中有一节标题就是：“生活的闹剧”。它是由枣园沟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李保一手导演的，他煽动钱老大、刘卯、张香莲到地委副书记龚大平面前，胡言乱语作出种种丑态去诬陷赵镢头，诋毁联产承包制。龚大平由此得出荒唐的结论：“他那把镢头是专挖集体墙脚的嘛，对于资本主义，不能手软！”结果闹剧酿成了悲剧！而短篇小说《挂匾》中写的那场热热闹闹的“夸富游行”，本身就是一出闹剧。闹剧是历史的否定面，这就是生活中何以会有闹剧因素，也有闹剧存在的原因。张一弓以闹剧来显示人生的严峻、严酷，是他对人生的一种发现、把握和思考。在当代作家中，采用这一艺术形式，透过生活的表象去揭示生活中某些本质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

再值得提出的是，张一弓作品的语言富有特色。他很注意对语言的锤炼和运用。他说：“我在人物语言中，采用了自己比较